

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意义研究

刘怡¹, 刘东彪²

1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 063210

2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 063210

摘要: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由“走出去”进入“融进去”的新阶段, 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展现出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一, 它有助于在全球英语主导的语言格局中平衡语言权力关系, 维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与公平性; 第二, 中文教育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推动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增强了各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第三, 英联邦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也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与政策支撑。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 英联邦国家; 国民教育体系; 语言霸权; 文明互鉴

引言

陆俭明曾指出, 中文能够进入众多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 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重要现象, 也是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吴勇毅, 2020)。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已从“走出去”进入“融进去”的新阶段。据统计, 截至 2023 年 5 月, 全球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 其中 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了本国国民教育体系(新华社, 2024)。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文及中华文化的价值, 中文日益成为“促进中国融入世界、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

英联邦国家多以英语和西方文化为主导, 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生态。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组成的英联邦目前包括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 56 个成员国。尽管英联邦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减弱, 但作为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其英语语言影响仍然深远。在这一背景下, 探讨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的意义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价值。一方面, 这有助于了解在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广中文教育所带来的深层影响; 另一方面, 也为国际中文教育在西方语境下的发展提供启示。本文将从抵制英语语言霸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分析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1]。

1 抵制英语语言霸权, 维护语言多样性

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由来已久。Phillipson (1992) 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英语语言帝国主义, 即英语在国际政治、经济、教育、媒体和文化等领域居支配地位, 挤压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Phillipson, 1992)。当今世界几种主要语言(汉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一时难以与英语匹敌, 英语的强势使许多非英语母语者感受到语言霸权的压力(史红梅, 2010)。由于殖民历史遗产以及与英国持续的联系, 英联邦国家的英语霸权现象尤为明显, 许多成员国至今仍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或主要教学语言^[2]。

将中文融入这些英语主导的国家教育体系, 对打破单一语言垄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 这有助于保护全球语言多样性, 促进多语教育的发展。儿童和青少年应掌握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知识, 以便在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Rhodes, 2014)。在英语占优势的英联邦国家, 引入汉语课程为

学生提供了另一种语言选择,丰富了语言生态,挑战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在中小学同时开设中文和英文课程,这些国家为年轻一代创造了传承自身文化和语言遗产的机会,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社会^[3]。

另一方面,中文进入主流教育也为英联邦国家与中国之间搭建起新的沟通桥梁。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各地对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英联邦国家推广汉语教育,有利于加强其与中国的联系,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这在削弱英语作为唯一交流媒介垄断地位的同时,也让各国能够以中文为媒介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对话。语言教育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学习多种语言将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使个人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Rhodes, 2014)。可见,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不仅是对英语霸权的有力回应,也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提供了更多元的语言技能,拓宽了其参与全球事务的渠道^[4]。

2 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语言是文明交流的纽带。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强调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谢清果, 2019)这一论述回应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文明共生互鉴的中国主张。英联邦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大大推动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汉语学习,学生可以直接接触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提高对中国价值观、社会习俗和思维方式的认知。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了解并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观是和平共处的基础。中文教育在英联邦国家的开展,有利于培养青年一代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力,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尊重与信任^[5]。

此外,将汉语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利于中华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学生通过学习中文,可以熟悉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社会习俗,从而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和认同。这不仅丰富了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阮静指出,语言承载着文化符号,汉语的传播实质上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阮静, 2023)。通过教育体系传播汉语,可以使中华文化精髓更加深入人心,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在世界格局剧烈变化、国家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各种语言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对于全球合作至关重要(崔希亮, 2022)。中文教育在英联邦国家的推进,为不同文明间搭建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有助于减少偏见与隔阂,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国际关系。

进一步来看,学生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也日益凸显。当他们在教育体系中系统学习汉语并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后,便具备了双语交际和文化解码的能力。这种文化理解不仅局限于课堂或考试之中,更体现在他们参与国际交流、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甚至未来从事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因此,中文教育不仅是一种语言教学的延伸,更是培养全球公民素养的教育策略。同时,汉语教学的制度化推进,也有助于推动中英联邦国家间在教师培训、教材合作与学术研究等领域的深层次教育合作,从而在更广阔的教育生态中实现共建共享,为中西文明的持续对话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3 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化可持续发展

中文被纳入英联邦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新的突破。汉语正逐渐成为全球使用人口众多的重要语言之一,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为国际

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坚实基础,也为中文进一步普及创造了新机遇。可以说,英联邦国家的实践加速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布局。从课程设置到师资培训,这些国家通过正式教育渠道教授中文,使汉语教学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学生得以在校内接受连续性的汉语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外或兴趣班,从而极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和覆盖面。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教育政策的调整上,更反映出全球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6]。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进入英联邦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还带来了示范效应,将激励更多国家重视并投入中文教育。当一个国家在公立学校正式开设汉语课程,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培训本土汉语教师、研发本土化教材、完善考试评估体系等。这些投入有助于提升全球中文教育的整体质量与水平,为中文国际传播提供坚实保障。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中文纳入教育体系,国际中文教育将呈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态势。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支持这一进程^[7]。2020年,中国教育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课程开发推广体系,优化汉语国际传播,支持更多国家开展汉语教学”等(王春辉,2021)。这表明在国家战略层面,中文融入他国教育体系被视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等外交大局的重要举措^[8]。

展望未来,中文在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深入普及,将进一步提高各国对中华文化的

认知与重视。汉语将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更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合作与和平的桥梁。可以预见,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国际中文教育将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培养更多懂中文、友中华的国际人才^[9]。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的进程,正为构建更加包容、互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意义是多层面的。它既是国际中文教育从“走出去”迈向“融进去”的里程碑式表现,也是对当今世界英语语言霸权的一种平衡和补充。从语言多样性的维护,到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化,再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拓展,汉语在英联邦国家教育中的传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现象体现出世界格局下语言文化互动的趋势:更多国家愿意将东方语言纳入其主流教育,为本国学生打开通往另一种伟大文明的大门。

当然,中文融入英联邦国家教育体系的进程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国推进的深度和力度不尽相同。要充分发挥其积极意义,还需要持续的努力。例如,相关国家需完善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和评估机制,加强本土师资培养和教材研发,使汉语教育更好地本土化、可持续。只有在政策、资源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形成合力,才能确保中文教育在英语世界中真正扎根,并结出丰硕成果。展望未来,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化,中文在英联邦乃至全球的传播发展有望更加均衡,成为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与理解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吴勇毅.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04):9-15.
- [2]新华社.新华时评:中文何以全球“圈粉”[EB/OL].(2024-06-08)[2024-07-09].
- [3]Phil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史红梅.从英语语言霸权与文化扩张透视当前的“汉语热”[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12(06):161-163.
- [5]Rhodes, N. C. Elementary schoo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Lessons learned over three decades

(1980–2010)[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14, 47(1): 115–133.

[6] 谢清果. 文明共生论: 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06): 72–83.

[7] 阮静.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国文化传播[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1): 82–90.

[8] 崔希亮. 世界格局剧烈变化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04): 1–9.

[9] 王春辉. 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2): 50–63.

作者简介: 刘怡(1978–), 汉族, 女, 河北省唐山市人, 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外语教学法。

刘东彪(1979–), 汉族, 男, 河北省沧州市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外语教育发展与政策、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项目: 2022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资助“世界主要语言配合支持他国国民教育体系经验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22YH108C)。